

罗传奇 吴云生 著

王安石

教育思想研究

江西教育出版社



21244047



1244047

王安石教育思想研究

罗传奇 吴云生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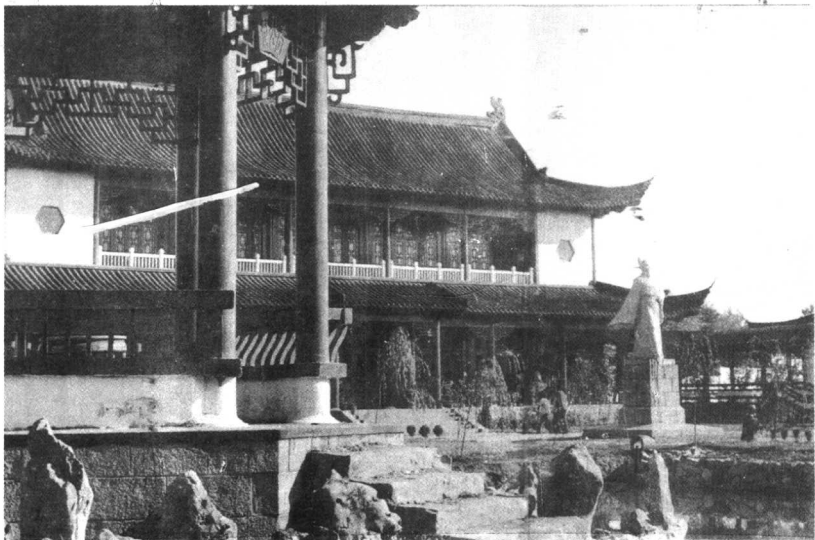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粤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2,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统一书号: ISBN7-5392-1075-3/G.1042 定价: 12.80元



王安石纪念馆



王安石南京著书处（现南京半山园）



王安石像

序

姚公骥

罗传奇、吴云生两同志合著的《王安石教育思想研究》一书即将问世，作者索序于我，自忖虽在学校执教数十年，所讲授的是中国通史，然于古代教育却甚乏研究，诚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实在不敢应命，但作者的盛情难却，只好信笔写一些感受，意浅词芜，有负作者厚爱多矣。

我一向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私学盛于官学也强于官学，而私学之中又特别重视师授与家学，率以师弟相承和家学渊源相标榜。即以北宋与王安石的同时辈为例，有如周敦颐任南安军（今大余）司理参军时，程颢、程颐的父亲程向任通判军事，乃命二子拜周敦颐为师，所以濂、洛二学派有师弟关系。而后程颢、程颐兄弟讲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从之。史称学于程氏之门者“固多君子”，如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等四人号“程门四先生”，成了理学洛派的巨擘。像他们的师弟关系，俨同父子，所以程颢得到杨时这样的学生，非常高兴，因杨时是福建将乐人，便说：“吾道南矣！”，而杨时对待先生程颐，也留下了“程门立雪”的美谈，类此这般的师弟相承的事例，在史书上多得不得了。至于家学渊源的事例也同样不胜枚举，仅以与王安石同时辈的江西人为例，除王安石的一家兄弟外，有如南丰曾巩的一家兄弟，新喻刘敞的一家兄弟，新喻孔文仲的一家兄

弟，波阳彭汝砺的一家兄弟，等等，都是同登史册的。《宋史》作者在刘敞、曾巩的传论上便说：“若刘氏、曾氏之家学，盖有两汉之风焉！”家学与门弟相结合，可以看成是观察中国古代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兴衰起伏的一根管钥。所以说，中国古代私学之盛且强，是历代官学难以比拟的。古代的官学，其在中央者，不管是太学、国子学或国子监，不管叫什么博士弟子、鸿都门学或广文馆。其在地方者，不管是乡党之学、郡国学、州县学或府县学，尽管在某些时候，特别是在初起之时，也曾有过讲授活动或教学活动，然而，为时不长即流诸形式，隋唐以降，官学又成了科举的附庸，大抵是“科场罢日，则生徒散归……但为游士应寄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听讲者。”甚至“视序庠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所以早在唐代，就已有“广文先生官独冷”的感喟。北宋时期的官学，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其景况大致如此，用王安石自己的话说，就叫做“取墙壁具而已”。当然，有的时候，在个别地区里，那里的官学也曾有过延揽名师，作育人才，一度有所振兴，如范仲淹守苏州，首建郡学，聘请当时大儒胡瑗主讲席，就是一例，不过从全局而言，这种事例，实在称得上凤毛麟角。惟其如此，所以，那时候的所谓人才，大都不从官学而来，官学之不受重视，可谓历代皆然。至于明清两代有所谓“纳监”，富家子弟通过向官府捐纳财货，即能取得国子监生的资格，便可以在科举考试上越过府州县学，而直接参与省会或京师的考试，这就更加等而下之，和学校教育成了两码事了。

正因为中国古代教育有上述一个长期存在的特点。因此，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研究上便长期存在着一个难题，一谈到古代教育制度，便大谈其官学，不管是否为具文，一律言之凿凿，煞有介事。而一谈到教育思想，则又只能撷取私家议论，尽管那些议论中不乏真知灼见，宏谋远略，然而他们大都与官

学无缘，不是空言无补，便是了不相涉，就象上面提到的那位“独冷官——广文先生”，是唐代与杜甫同时的郑虔，这位郑先生却的确做了主管教育的官员，专教“国子学生业进士者”，然而，我们只知道这位郑虔先生是一位诗、书、画号称“三绝”的艺术家，并没有人说他是一位教育家，他在教育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业绩。看来，这位广文先生的处境确如杜甫说的那样：“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赖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甚至到了“甲第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的程度。官冷如僧，馆同虚设，得不到王朝一丝一毫的重视，还有什么教育上的作为可言。所以说，管官学的谈不到有什么教育思想，有教育思想的又谈不到去管官学，即使管了也无法有所施为，有所建树；一方面成了徒具形式，一方面成了徒托空言，充其量只能在私学上付诸一点实践而已。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不仅两者往往是脱节的，而且两者都难以形成具体的历史，所谓教育制度只是写在纸上的具文，当然说不上有什么实践上的历史价值，而所谓教育思想既不能形成制度，付诸实施，除了作为思想史上的一项精神财富外，也谈不上有很多实践上的历史经验。我看到的一些教育史的著作，大都在这个历史难题上显得左支右绌，史乎？史乎？殊难言矣！因此，我才大胆地认为要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应该改弦更张，以私学为主，官学只能摆在附庸的地位，略略一提就可以了。把历代私学研究透彻了，那末，诸家的教育思想就可以从私学中发掘出其实践上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显现出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真面目。因为这种现象恰恰是那种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必然产物，恰恰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官僚政治下的必然产物，恰恰是中国古代宗法家族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然而，历史上也有若干例外。象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教育

制度的改革，却的确是以王安石的教育思想付诸官学教育的一次实践，一次试验，正因为这是一次例外，所以，在历史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创举。

在这篇短文里，我不想就王安石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再说些什么，因为本书作者已经作了系统而详实的研究，相信读者能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东西。我想说的是，这项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教育思想与教育改革相结合、与教育制度相结合、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典型，这是真正的一次教育改革，它改革的是官学，不是私学。它的影响很大，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冲击波，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而这种赞成与反对，不仅仅是学术上的、理论上的，而是成了当时政治斗争中或者说是朋党斗争中的焦点之一，延续的时间也很长。至于它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谓不大，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都有，因而关系到了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关系到了王安石还能不能作为一个教育家（除了政治家、文学家而外）而载诸史册。

我认为王安石作为一个古代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学问胸襟，识见胆略都是超越时辈的。他所著的《三经新义》，连他的政敌也不敢轻视。他主张培养人才必须兴学校，太学实行三舍法，同时改革科举制度，罢废明经诸科、增进士额，又罢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并规定要以他的《三经新义》为依据。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培养出能够“经世务”的人才，立即能推行变法改革的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恤人言，力排众议，锐意行之。可见，王安石的教育改革主张的政治目的是极为鲜明的，是他的全面变法（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说，他确实站在他所处时代的前列，他的有关教育改革的思想至今还存在着许多闪光的东西。

然而，他的变法后来失败了。他的教育上的改革也跟着失败，或者说被扭曲了。当然，这里面有种种原因，无待细述。不过还需要提到一点的是，王安石对官学的改革遭致到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无法废除科举考试，尤其是他无法提出一项有利无弊的考试方法。考试制度历来有利有弊，也经过了多少次的改革。所有改革的总趋向，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大体说来，不外两条：一是不断地加严；二是如何使评卷做到公允。加严好办，如弥封、誊录、监临、锁院、搜身等等，越到后来越严，形成了一套规矩；而阅卷要求公允则十分不好办。写文章不像做数学题，很难作出为考官们都能确实把握到的客观标准，结果，一篇文章在张三看来好，李四却可以说不好，并且都能说出点理由，相持不下。因此，为了统一标准，只好舍内容而取形式、或者专试记诵，如唐宋试明经的帖经，类似今天的填空，记得的就对了，记不得的只好交白卷，这种卷子好评，但又因只考记诵，而且题目越出越僻，遂为世人所轻。于是进士科要试诗赋，诗赋可以试出人之才与艺。但为了便于评卷，又不得不在形式上多加限制，律诗“八病”之名由此而起，什么“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在考试中均不得患其一病。这些限制始于唐代，到了宋代遂更趋严密。明清以来的试帖诗相沿不改。所以弄得凡是应试之诗，几乎没有一篇好诗，但对评卷而言，舍内容而取形式，标准毕竟好掌握一些。王安石主张废诗赋而考经义，曾经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从大道理讲，诗赋不能“经世务”。不能识别政治人才，王安石的主张当然是堂堂正正；然而，从小道理讲，苏东坡则谓设科立名，是教天下以伪，策论诗赋，自政事言之，均为无益。不能说他这番话没有触到疼处。毕仲游更直截了当地说：“诗赋必自作，经义可用他人；诗赋惟校工拙，经义多用偏见。”考试只校工拙当然便于评卷，一涉经义，便各抒

已见，没有评卷标准，至于能否拔擢政治人才，则诗赋与经义都不见得有用。这确实都是科场经验之谈，不容否认。果然，考经义也同样弄得流弊丛生，连王安石也有些后悔，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慨乎言之。我们翻翻历代的科举应制文章，如经义、策论之流，也确实没有什么好文章，象远在科举之前的汉代董仲舒的贤良对策的所谓天人三策，后于王安石的南宋末年文天祥中状元的集英殿试策——洋洋万言的所谓“法天不息”试策，这样的应试文章在历史上确实稀罕得很。至于经义之文，则几乎找不到一篇像样子的。而且经义一纳入科举考试，为了避免评卷中的“偏见”，统一标准，逐渐地不得不也舍内容而取形式起来。而且标准定得越来越死，这就形成了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八股”。不仅题目有范围——“四书”，考生只能“代圣人立言”，且不能脱离朱熹《四书集注》的内容，而且，行文有一定程序和规范，这就是所谓破题、承题、起讲、起股、中股、后股、末股等名目，结果自然是废话连篇，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害人不浅。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帮助考生们做好“八股”，明清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赚钱职业，其人则叫做八股选家，像《儒林外史》上的马二先生那样，专门为考生们提供八股选本，以供考生们借以揣摩、研习、记诵、模仿、抄袭之用。如同今天大量销售的什么升学指导或指南、复习提要或解答之类。当然，这类书为图书馆所不录，藏书家所不收，就连考生一经入学，也就立即弃之如敝屣。然而这些选家却从中大捞了一把，还自认为有益于考生，其实，造成考生们的知识面不仅狭窄，而且支离破碎的，正是这类选家。考诗赋则带来“八病”，考经义则带来“八股”，舍内容而取形式，这真正成了科举考试的痼疾。八股源于经义，这已为世人所熟知，而却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考试制度的改革关系到教育制度的改革，而考试制度中的

评卷问题更是一个举世烦恼的问题。恐怕至今世界上也没有真正解决好了的。如此说来，研究王安石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思想，总结其经验教训，就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还有其现实意义了。

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临川人。罗传奇、吴云生两同志是在抚州执教多年的老教师，一直从事王安石研究。由他们二位来研究王安石的教育思想，以内行而兼乡谊，必深刻而又亲切，是再合适也没有的。我非常希望江西的学者都来研究江西的历史和历史人物，更希望罗传奇、吴云生两同志继本书出版之后，将有更多的科研成果问世。谨序。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王安石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
第一节 王安石的时代和生平	1
第二节 王安石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7
第二章 王安石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32
第一节 天人观与形神观	32
第二节 认识论与方法论	42
第三节 性习论与情性论	54
第三章 王安石的教育理论	66
第一节 关于教育的目的和作用	66
第二节 关于陶冶人才的思想	75
第三节 关于教学思想	95

第四章 王安石的道德教育思想	107
第一节 论道德的本质和特征	107
第二节 论道德的规范和范畴	119
第三节 强化道德教育的具体主张	134
第五章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主张	143
第一节 改革科举考试制度	143
第二节 改革学校教育制度	155
第三节 改革学校教育内容	170
第六章 王安石教育思想同宋代其他著名教育家的比较	193
第一节 同李觏的关系和比较	193
第二节 同曾巩的关系和比较	203
第三节 同程颢、程颐的关系和比较	213
第四节 同朱熹、陆九渊的关系和比较	226
第七章 王安石教育改革思想的特点、地位及影响··	240
第一节 教育改革思想的特点及其地位	240
第二节 教育改革思想的影响和启示	254
附录一 王安石教育文选	264
附录二 王安石生平年表	276
后记	286

第一章 王安石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北宋中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王安石正是这个时代涌现的著名改革家。他的教育思想也正是在这场改革潮流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认真研究王安石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王安石的时代和生平

（一）王安石生活的时代

唐朝中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各地节度使逐渐积蓄了自己的力量，控制了兵权，成为与中央政府相对抗的地方势力。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藩镇之间，相互征讨，战争不断，使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遭受了巨大的破坏，给广大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使封建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人们迫切要求结束分裂和战乱，实现统一和安定。宋太祖赵匡胤顺应历史潮流，于公元960年发动了“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恢复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国家。

宋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加强中央集权制度，采取了一

系列的措施：

集中军权。一方面解除元勋宿将典禁兵权，让他们做空头的节度使，改派比较容易驾驭的人统率禁卫军；同时任用文臣做州县长官，禁止武臣干政，收天下精兵，集中于首都及其附近，以免武人跋扈割据。全国军队分为禁兵、厢兵、乡兵、蕃兵四种，均掌握于中央的枢密院，也就是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为了进一步防止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更以“习勤苦，均劳逸”为名，立“更戍法”，令禁兵每三年实行一次轮换，将领也经常调动，使“将不得专其兵，士卒不至于骄惰。”^①

集中政权。把前代无事不统的宰相权力，分为军事、行政、财政三部分。中书省管政事，执政的宰相称“平章事”，但不能总揽全国军、政大权。而由枢密院的枢密使掌管军事。枢密使也不能统帅禁兵，把禁军分为三个系统，各有统帅。设三司使掌管财政。另设御史台、谏院，监察考课朝廷官吏的得失。节度使不管州府政务，各州府直属中央，由皇帝委派官吏管理政权。同时在各州、府行政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一名，使其与知州互不通属而又互相牵制，名义上是帮助地方行政，实际上却是为了控制和监视地方官。知州和通判三年一换，使其无法形成地方势力。此外，重要刑狱地方官吏不得专擅，必须由中央甚至皇帝本人论决，这样司法权也集中了。

集中财权。由中央所派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除诸州度支经费外，概输中央，以使“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②

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北宋统治者将“兵也收了，财也收

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三。中华书局1957年8月版。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

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①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

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确立，为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

北宋农业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宋仁宗赵祯统治时期，全国荒地基本垦殖完毕。为了扩大耕地，出现了圩田、山田、淤田、葑田等垦田形式。在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改良农作物品种、发展经济作物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北宋的手工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矿冶业、陶瓷业、造船业、兵器制造业、纺织业、造纸业、制盐、制茶、制糖等业，都具有相当规模，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超过前代。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成了商业的繁荣。当时除国内有发达的贸易外，沿海城市广州、杭州、明州、登州等同日本、朝鲜、南洋、大食的海上贸易也非常繁荣。为了适应商业往来的需要，北宋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城市也发展了，全国著名的城市很多，多散布在水陆交通要冲或沿海港口。北宋的首都东京（开封）成为全国政治、商业的中心。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北宋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作为北宋技术发展的主要标志的指南针、造纸、印刷、火药的制造和使用，又有新的发展。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生物学和建筑技术方面都有重大成就。天文学家苏颂所著的《新仪象法要》具有极高的科学水平，书里记载了一种“水运仪象台”，也是世界最早的天文钟。数学家贾宪提出“增乘开方法”，不仅可以开平方和开立方，并能求出任何高次

^①《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

方程式的正根。北宋初年修的《开宝本草》所收药物，比唐修本草增多了132种。太医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铸造的针灸铜人模型，是针灸学上的重大发明。大建筑家李诫写的《营造法式》，是一部世界上最早最完备的建筑学巨著。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综合性的科学著作。丁度、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是一部军事百科全书。这些都标志着北宋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

北宋在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巨大的成就。如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大师。在哲学方面，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史学方面，有当代史、断代史、通史、地方史志、金石学、目录学、类书等重要成果；在文学方面，话本、戏剧、词、诗、散文、笔记小说大量涌现；在艺术方面，绘画、书法，雕塑也有很多不朽佳作。

北宋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发展，对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形成学以致用教育观点都起了较大的作用。

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有促进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积极一面，但也产生了不少流弊。

军权的集中带来了军力的削弱。由于过度不信任武人，不相信地方力量，而“更戍法”又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再加上作为正规军的禁兵和厢兵又多是招募组成的职业化军人，终身当兵，最易骄惰。厢兵故无训练，即使禁兵的训练也逐渐废弛了。为了防范在外将帅擅权，朝廷经常派出宦官作为监军加以挟制、监视；作战时，只能按照皇帝亲自授予的阵图进行部署，严重地束缚了将帅指挥的主动权，致使将士“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战斗力大大削弱。因而在与辽、夏的战争中，“动而奔北”，屡遭失败。由于严重地削弱了军事力量，北宋中期后出现了“积弱”的局面。